

亲预感到必须尽快离开东北，于是全家逃亡关内。

象我父亲那样敢于冒着危险、冲破阻碍向李顿调查团递交反对“满洲国”的书函、信件、请愿书、申诉贴者为数甚多。全系工人、农民、教员、学生等普通民众自发的反满活动，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。李顿调查团仅在东北各地就接到反对成立“满洲国”的书信达1548封。这充分反映了东北人民反对国家分裂的愿望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。

（摘自《黑龙江文史资料》第十八辑）

我在国联调查团的一段经历

顾维钧

临近1931年底，国联行政院决定派遣委员会调查满洲的情势。1932年1月12日，国联行政院核准任命5个委员，团长是李顿爵士……我被任命为中国代表，正如日本任命吉田为日本代表一样，那时吉田是驻土耳其大使。……

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出发，我们到了吉林。我记得在火车站上，有一大群日本军民代表和所谓满洲国政府的代表。在中国人中间，我注意到沈瑞麟先生，他在北京当过我的次长（他当时是伪满洲国的外交大臣）。

日本代表和所谓满洲国代表迎接了调查团成员，而且给他们准备了汽车。当然也给日本顾问和他的秘书们准备了汽车。于是我问我的一个秘书，我的车在哪里。我发现，调查团的人和日本人都已经走了，我和我的秘书们被留在车站外边。有几个中国人看到我难堪的处境，其中一位过来对我说，他以前见过

我，他和他的朋友可给我找一部汽车，把我和我的秘书送到调查团住的旅馆去。我很高兴弄到交通工具，但是我怕日本人会给这些帮我忙的中国人找麻烦。我们被送到驻军司令部的接待大厅，我们刚坐下，一群日本军官身挎军刀走了进来，他们都不搭理我，好象我没在似的。

后来我被安排到调查团及其工作人员住的旅馆。我在那里的整个期间，透过旅馆窗户所看到的情景，使我深为感动。调查团得到通知，早晨某个时候要为他们举行公开欢迎会。我想是在早晨10点钟，我看见成百上千的人，也许有2000名学生，大部分来自小学和中学，每人手拿一面旗帜——一面日本旗或一面“满洲国”纸旗向调查团住的那条街走过来。在他们的两边，每隔几步，就有一行显然是身穿便衣的日本人。他们看来很象是日本在满洲的秘密情报人员，他们目光逼人，面色严厉，表情很不正常。

队伍停在调查团住的旅馆门前。调查团的人都走出去。有一个中国人“代表中国人民”呈递一份请愿书。沿着欢迎队伍，约有15至20名日本人，队伍旁边的日本人叫：“挥动旗帜！”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男女孩童很不情愿地开始挥动，完全没精打采。然后奉命喊些“满洲国万岁”之类的口号。那是很令人伤感的事，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些年轻人虽然在做别人叫他们做的事，但是完全理解它的意义，他们只是依据日本人的命令行事，被驱使来递送支持“满洲国”的情愿书。这些青年脸上不但表示毫无兴趣，而且表示一种不是悲观就是愤恨的感情。我从旅馆的三楼目睹了这一情景。

午餐时我们受到款待。因为我属于陪同调查团来的人员，也被邀请赴宴，但是没有一个人理我。他们都在集中招呼调查团。即使我的同事日本顾问也好象看不见我出席似的。

在吉林停留期间，我的一个仆人在街上从一个中国人手里接到一张条子，条子上写的是：“我们在请愿书上向调查团所说的话是日本人口述的，我们并不同意。我们真实的心情是……（如此这般），你们会在这信中发现我们真正的感情。”调查团所到之处，都重复出现这种事。

我们从吉林到了哈尔滨，计划在那里停留几天。实际上待的时间较长，因为松花江北边已发生战斗，在旅馆里几乎通宵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。半夜里我从旅馆的窗户外望，可以看到一长列日本坦克和装甲车开去和马占山、李杜率领的中国军队作战。事实上我们一到达，一个中国军队派来的人就同我取得联系，并且告诉我，中国军队就要向日本人进攻，要同日本人战斗到解放东北为止。他们要调查团知道，东北人民绝对不愿生活在日本傀儡统治之下。战斗推迟了调查团到齐齐哈尔去的日程，也使得日本人对代表团进行了监视，对我的监视更加严格起来。我通过跟随我的4个人继续接到秘密的请愿书和信件。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。我和端纳先生及何士先生——一个是澳大利亚人，一个是加拿大人一直在一起。由于是西方人，他们能够有较多的活动自由去接触哈尔滨的一些外国见证人，查明实际情况。他们发现，尽管日本人控制着哈尔滨，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并无信心，因为中国军队集结在松花江的北岸，日本人预计中国军队会渡江进攻哈尔滨。

因为我有每天下午以散步当作运动的习惯，所以我每天去公园走走。有一天清早，我的随从之一（过去在警察局干过事的北京人）向我报告，哈尔滨的一个警官托他告诉我，那天早晨（实际是每天早晨）一个日本军官和中国警官（有时和一些做情报工作的白俄和朝鲜人）开会商量阴谋暗杀我，所以要求我不要到公园去散步，因为他们已发现我的习惯。我很为这个

报告担心，因为我知道日本人密谋下此毒手并非是不可能的。但
我又觉得有几分奇怪，疑心日本人果真敢这么干！我对随从说，
如果我由于这个警告改变去公园散步的习惯，日本人会说我这样
做是屈服于他们的恫吓。所以那天下午我同比平常更多的人到公
园去，除了随从还有两个西方朋友端纳和何士。在公园里没有遇
到任何危险，但是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情景。在一定距离之外，当我
走这条路时，另一方面有三个学生模样的中国人，他们注视着我并
试图接近我。我觉得很奇怪。由于这些人是年轻的中国人，我想他
们也许要同我谈话，所以我转到他们的方向，我们走在两条道路
上。但在我转到他们走的小路去之前，有四五个日本人从不同方
向突然走上来堵住他们的路，后来他们把这些中国人带走了。所以
我说：“看，我是对的。”很多中国人，爱国的中国人，他们要接
近我，告诉我一些事。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对我怎么样，因为我确
信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

就在同一天晚上的半夜时分，我正要上床就寝，我的随从
张某诉我，有一个从警察局来的中国人要见我，亲自告诉我一些
事。我说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的，我在北京时认识他。”

当年中国的一些大城市，警察力量薄弱，于是从北京征募
人员来加以充实。这些人都是在北京由一个名叫曼德的挪威将
军训练出来的。那时曼德受中国政府雇用，在北京办了一所用
新式方法训练警察的学校。因此，不少城市从北京招募警察去
当地工作。即使在上海，也有受过现代化训练的北方警察。曼
德在北京十分知名，他是在清政府下面从事工作的。

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人，他半夜里来了，要见我，我问他：
“为什么你来得这么晚？”他说因为到半夜他的同事都回家休息
了，他来看我不会引起注意。由于在北京见过我，所以在这里
看到我就认出来了。他叫我总理。他说他要来告诉我，那天早

晨日本人原来已经决定行刺，但是公园里碰到三个中国学生要同我接触，日本人的行刺计划受到牵制，因为日本人不愿有中国人作见证。所以他请求我再也不要到公园。我说散步是我经常的习惯。接着我问他：“你为什么来？”他说：“这是‘满洲国’，但是我的心仍然向着中华民国。虽然我在日本管辖下的警察局里当差，我总想着中国。”

所有这些清楚地向我表明这一事实：东北人民除极少数同日本人有特殊利益的人以外，全都反对日本人。我可以说不99.9%的东北人民反对日本人。这是经调查团肯定了的看法。调查团自己派人去市里不同地区、甚至乡村会见懂事的农民和商人。调查团人员都深信，日本人说满洲国是中国人倡议创立的，这完全是一派胡言。

（摘自《哈尔滨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）

国际联盟处理 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后经过

吴秀峰

我于1928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，应国际联盟秘书长聘请到日内瓦国联秘书厅工作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我曾参加过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的调查工作，现将当时情况记述于下：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中国与国联的关系

国联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条约而成立的。当时